

西方著名法哲学家丛书（第三辑）

吕世伦 徐爱国 主编



马里旦： 自然法的现代复归

杨天江◇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西方著名法哲学家丛书（第三辑）

吕世伦 徐爱国 主编



马里旦： 自然法的现代复归

杨天江◇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里旦：自然法的现代复归 / 杨天江著. --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3
(西方著名法哲学家丛书 / 吕世伦，徐爱国主编.
第3辑)

ISBN 978 - 7 - 81129 - 477 - 4

I. ①马… II. ①杨… III. ①马里旦, J. (1882 ~
1973) - 哲学思想 - 思想评论 IV. ①B56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6341 号

马里旦：自然法的现代复归

MALIDAN; ZIRANFA DE XIANDAI FUGUI

杨天江 著

责任编辑 李宏弢 曲丹丹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
字 数 202 千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477 - 4
定 价 2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人类的法律文化或法律文明,可以区分为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两大载体。法律是硬结构,法律思想是软结构。历史地看,它们共生并相互渗透和依存。比较而言,法律制度通常趋向于稳定和迟滞,而法律思想则显得敏锐和活泼。由于此缘故,一个时代的法律文化变迁,总不免表现为法律思想为先导,法律制度随之产生或变革。

中国为古老文明的大国,原本有自己独到的法律传统,也有自己的法律思维范式。临到清末,在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法律文化传统出现断裂,开始发生历史性的转型。早些时候,中国人学习日本,而日本的法律又来自于西方的德国。晚些时候又学习苏联的法律,中国法律传统又增添了社会主义法律的色彩。这样一来,我们现今的法律同时是中国传统法律、西方自由主义法律和社会主义法律的混合体。反过来也可以说,我们的法律既欠缺中国传统,也欠缺东洋(日本)和西洋(欧美)的法律传统。法律职业者们所学和所用的是西方的法典,而要解决的则是中国社会本身的问题。

不可否认,近代以来的西方法律是摆脱人身依附关系及倡导民主与法治的先行者。因此,对它不应当亦不可能漠然对待,更不能简单地予以排斥。不过,在东西方有重大差异的法域,法律职业者生搬硬套西方的法律理念处理中国的问题,就

意味着粗暴地对待了中国的社会。另一方面,当法律职业者们这样做的时候,又没有真正弄懂西方法律制度得以建立的法律理论,这又粗暴地对待了西方法律。中国学习西方法律已是历经百余年的不争事实。现今,法律制度的趋同化与各民族法律个性的减弱,是法律发展的一般模式。面对此种时代的大趋势,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要建立现代的法律体系,更重要和更深层次的在于弄清作为西方法律制度底蕴的法律思想。换言之,法律的研究和运用,只停留在法律制度的建立及相关资料的整理和解释上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该是法律规范与法律精神的统一。善于从法律制度中寻找法律的精神,从法哲学的抽象中探取法律实践所隐含的意义,才是中国法律职业者的共同任务。

从中西法律制度借鉴的角度看,我们更多地移植了西方的法律制度,而对西方法律精神则关注不足,主要表现在没有把握到西方法律的精髓。只有法律制度的引进,没有法律思想的参详,如同只有计算机的硬壳而无计算机的软件;没有法律的思想而实施法律的制度,那么法治的运行便成为无从谈起的问题。理解、消化和应用西方法律制度中所包含的法律理论,是我们继续和深化法律现代制度的紧迫任务。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决定编写一套西方法哲学家的学术传记丛书。

西方法律思想存在于西方法哲学家的脑子里,表现在他们各具特色的个人生活之中,物化于他们的法律著作之内。每个法哲学家的思想各不相同,但是同一时代的一批法学家则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文明。同样,每个时代法学家的思想也各不相同,存在着主流与非主流甚至逆流的思想观点的交叉与对立。几千年西方法律思想家的理论传承,构成了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全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套丛书的着眼点是法学家个体。通过每个法学家独特的经历、独特的思考和独特的理论,我们能够把握西方法律传统的精神和品质。

今天,我们正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

系。这首先就要求有充实而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念要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指导下,广泛借鉴古今中外的法律精神遗产,尤其要“立足中国,借鉴西方”才能达成。

是为序。

吕世伦 徐爱国

2008 年 12 月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马里旦:其人其作	4
一、灵性之旅	4
二、社会政治生活	13
三、主要著作提要	17
第二章 马里旦与托马斯主义	26
一、托马斯主义的历史	26
二、马里旦的历史使命	35
第三章 现代精神与人本主义	43
一、现代世界的精神危机	43
二、人本主义	64
第四章 人的权利与自然法	76
一、自然法	77
二、自然法与其他法	93
三、自然法与自然权利	99
第五章 人与共同善	119
一、共同善	119

二、人的终极目的与共同善	126
三、人格主义理论与共同善	131
第六章 人与国家	148
一、概念的澄清	149
二、现代主权之殇	159
三、教会与国家	168
四、世界政治体的构想	181
第七章 论民主	191
一、民主的含义	193
二、民主与权威	201
三、民主宪章	209
第八章 论平等	220
一、反基督教的奴役哲学	221
二、伪基督教的平等主义	225
三、基督教的平等观念	228
第九章 论自由	237
一、自由的两重含义	241
二、自由机制的适用	249
参考文献	256
附录：马里旦年谱	263
后 记	267

导 论

对至善至美生活的追求是人类久已确定的目标,但历史所揭示的往往是与之失之交臂的痛苦与彷徨,以至于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把它视为某种终极理想的设定。20 世纪前半叶人类所经历的苦难和病痛不仅提醒人们文明生活的成就并非理所当然,同时也敦促人们重新思考人的潜能与现实、人类历史的机遇与必然。当西方文明越出地域的界限,觊觎那睥睨一切的主宰地位时,与其责怪它的桀骜不驯,毋宁探究它的根基所在。因为在一个没有旁观者的时代,参与的前提是理解与同情,而不是被迫卷入时的无奈与愤慨。西方文明枝节丛生,自不待言。就一般意义而言,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精神、古罗马法律中的法治理念,以及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曾短兵相接的基督教思想共同塑造着这种文明的主体。然而,这三种因素并非相互孤立、泾渭分明,相反,它们在人的心灵结构中、在宇宙论的生存秩序中互相补充、彼此相连。因此,当我们在伟大的古希腊传统中感受到城邦秩序与理念秩序的张力,在基督教兴起之后的罗马发现世俗政权与教会权威之间的抗衡,在屡遭非议的中世纪经院主义哲学那里读到人类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协调时,我们丝毫不应怀疑人类试图在世俗秩序之外追求永恒价值的努力,也不应轻视知识精英超越地域、时空界限抒发非凡才智的魅力。

伴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人类精神文明的历史步入近现代。人文主义者自命为古希腊罗马传统的唯一合法继承者,不遗余力地批判经院主义传统。及至宗教改革在“唯独圣经、唯独信仰、信

徒皆祭司”的信条之下，神与人之间关系的视角渐渐转换成了人与人、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视角。宗教信仰彻底变成了私人事务，完全失去了其整体意义。然而，在知识的传承上，中世纪并非毫无建树，恰恰相反，它对古代思想的解释和保存贡献卓著；同样，传统的基督教精神也并非一无是处，它对维护西方精神世界的统一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宗教在 18 世纪以前对于西方世界的文化和社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在那之后宗教不得不面对来自更多方面的知识和权威渊源的挑战。然而即便如此，由于宗教规范已经在众多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关系中确立下来，因此，它至今仍然在人们的道德良知和社会生活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教会和教堂不再是人们活动的中心，虽然教义和教规不再具有有形的强制效力，但是宗教信仰和内心确信仍然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人们作出具体的行为决定，宗教观念和宗教争端仍然不失时机地渗透于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各个领域。

在基督教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它与犹太教、伊斯兰教之间就世界秩序和文明形态的竞争与冲突从未平息过。在过去的二百多年内，它们一道共同对抗着世俗主义、人文主义、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以及其他类似的社会思潮。近代以来，随着社会政治问题的凸显，基督教思想家们也不再囿于神学的争论、教理的探究，而是把视角延伸到更为广泛的主题之上。20 世纪这类思想家中首屈一指的，莫过于在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都成就斐然的法国天主教哲学家雅克·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除了哲学家的身份，马里旦还是天主教皈依者、托马斯主义者、政治家、教师、牧师、文学研究者与耶稣小兄弟会成员。他以中世纪经院主义大师天使博士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的理论为根基，以托马斯主

义知识宝库中的概念术语为载体,系统阐释并深刻批判了他所认识的现代世界及其病症,其中涉及科学、形而上学、美学、政治哲学、教会和国家以及教会学等若干领域。在政治和社会思想领域,他秉持托马斯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致力于完善基督教的道德和神学理想以及一种自然法的原则,旗帜鲜明地为民主制度辩护,严格区分了国家与社会,明确指出了人类行为的共同善目标,系统奠定了人的权利的超越基础,并且牢固确立了人类个体与人类制度的善恶标准。马里旦的著述和思想对托马斯主义的复兴和 20 世纪天主教运动具有重大的影响。正如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①在为马里旦《宗教与文化》题写的导言中所说,“马里旦是天主教思想复兴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一种精神秩序的观念一直是他所有著述活动的指导原则。他也一直是那种思想重新定位的领袖之一,他把这种重新定位称为‘通过理智这种方式,为着精神主导,向着真理和绝对者的回归’”^②。

① 克里斯托弗·道森(1889—1970)是与马里旦同时代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化哲学家,被誉为“基督教文化的使徒”。年轻时即加入罗马天主教会,整个一生都致力于促进基督教道德和神学理想及其自然法教义的发展。主要著作有:《进步与宗教》、《基督教与新时代》、《宗教与现代国家》、《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等等。

② Jacques Maritain: *Religion and Culture*, trans. by J. E. Scanlan With and Introduction to Essays in Order by Christopher Dawson, London: Sheed & Ward, 1931, xxvii.

第一章 马里旦：其人其作

如果没有托马斯主义化,那将是多么不幸!——雅克·马里旦

一、灵性之旅

雅克·马里旦于1882年11月18日出生于巴黎。他的父亲保罗·马里旦(Paul Maritain)是巴黎律师公会的成员,有着长达30年的执业经历。母亲吉娜维芙·法芙尔(Geneviève Favre)则是一位自由派新教徒。在马里旦的成长过程中,他更多地受母亲的影响,特别是当他的父亲与母亲分开后。法芙尔出生于一个政治和知识家庭。她的父亲儒勒·法芙尔(Jules Favre)是19世纪后半叶著名的共和派政治家。他传递给女儿法芙尔的是对自由的热爱,而这又在小马里旦的心中生根发芽。“雅克家庭的主色调是对人的理想主义的爱、共和精神,以及为自由的政治斗争。”^①马里旦幼年时虽然受自由主义新教的熏陶,但他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宗教教育,也没有明确的个人宗教信仰。^②

儿时的马里旦是一个“书虫”,健康状况不佳。母亲经常鼓励他到户外写生。年长他七岁的姐姐珍妮(Jeanne)对他爱护有加,并且在许多方面激发了他的智力天赋。1898—1899年,马里旦入亨

^① Raïssa Maritain: *We Have Been Friends Together*, p. 40, see Marie and Tony Shannon, *Jacques Maritain*, Jacques Maritain Center: Readings.

^② Gerald A. McCool: *Jacques Maritain: A Neo-Thomist Classic*,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Vol. 58, No. 4 (Oct., 1978), p. 387.

利四世公立中学(Lycée Henri IV)学习,后来进入巴黎大学,1900—1901年准备哲学资格考试,1901—1902年准备自然科学资格考试。他最初感兴趣的是斯宾诺莎的哲学。^①在巴黎大学学习期间(1900年左右),马里旦遇到了一个年轻的犹太女孩,她就是蕾莎·欧曼扫芙(Raïssa Oumansoff)。蕾莎1883年出生于俄国的罗斯托夫州,10岁时随父母移民到法国巴黎。她很早就表现出了智力天赋和艺术才能,16岁入大学学习植物学、生理学和胚胎学。在一次课后反对专制独裁粗暴对待俄国社会主义学生的签名中二人相识。那时一个意气风发,另一个风华正茂,二人很快坠入爱河并于1904年11月以非宗教婚礼的形式结婚。他们不仅是终身的伴侣,也是最真挚的朋友。蕾莎说如果没有马里旦她会一无所获,而马里旦也把蕾莎视为自己最大的收获。他们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走到一起,相伴终生,既可谓情投意合,也可谓天作之美。



雅克·马里旦夫妇

^① Jacques Maritain: *Natural Law: Reflections on Theory and Practice*,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William Sweet, South Bend, Indiana: St. Augustine's Press, 2001, Introduction. p. 3.

1901 年左右,马里旦结识了其生命之中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查理·贝圭(Charles Péguy)。二人之间已知的最早通信是马里旦写给贝圭的,落款日期是 1901 年 3 月 13 日。信中马里旦恭维了贝圭的文章,同时言语之中也反映出马里旦对物质主义和无神论的轻视及对高级宗教理想支撑人类精神的向往。^① 在巴黎大学求学期间,年轻的马里旦开始了对生活意义的追问。这部分追问是由巴黎大学授课老师的科学至上主义和不可知论引发的,用蕾莎的话来说,“这些老师对真理丧失了信心,对他们来说真理就是令人生厌的代名词”^②。同样,那时的蕾莎也为生命意义的终极谜题所困扰。“她和马里旦一样,对科学和哲学无法解释生命的谜题而感到绝望。长时间无法探寻到生命的意义使得这对已经订婚的恋人双双产生了自杀的念头。”^③ 在他们精神上最痛苦的时候,正是他们的好朋友贝圭把他们引向了柏格森哲学。蕾莎在其自传体著作《伟大的友谊》(*Les grandes amitiés*)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当时贝圭发现他们处于一种极端的幻



查理·贝圭

① Pierre L'Abbé: Jacques Maritain and Charles Péguy: A Reassessment, in John F. X. Knasas (eds.), *Jacques Maritain: The man and his Metaphysics*, American Maritain Association, 1988, p. 46.

② Stephen G. Carter: The “historical Solution” versus the “Philosophical Solution”: The Political Commentary of Christopher Dawson and Jacques Maritain: 1927 – 1939,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69, No. 1 (Jan., 2008),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p. 97.

③ Gerald A. McCool: Jacques Maritain: A Neo – Thomist Classic,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Vol. 58, No. 4 (Oct., 1978), p. 387.

灭感之中,就带他们去听柏格森的讲座。同他们一起听课的除了贝圭还有乔治·索雷尔(George Sorel)和恩斯特·普希卡利(Ernest Psichari)等人。这些人既见证了柏格森哲学的生命力,也反映了当时知识青年追求生命意义的热切渴望。

柏格森的哲学对年轻的马里旦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柏格森那里,对生命的理解一开始就与物理学家们的理解判然有别。在物理学领域中,由于物质和能量守恒定律,永远不会产生任何新的东西,因此“未来的大门关闭着”。然而,“在生命中却相反,未来的大门敞开着。变化的过程是个创造的过程,它创造出真实新奇的事物”^①。柏格森的讲座为马里旦揭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生命世界,在那里到处体现着自由、勃勃生机、进步和富于创造。柏格森的哲学对马里旦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马里旦关于人格和直觉的理论从柏格森那里受益良多;其二,柏格森对马里旦的影响也是他最终皈依天主教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对物质主义、不可知论的不满,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以及柏格森理论为其开启的新视野,这些因素都触发了马里旦对宗教信仰的追求。那么,他与莱昂·布罗伊(Léon Bloy)的结识和友谊显然大大促进了他的这种宗教追求。1905年6月,马里旦在一份报纸上读到布罗伊的一篇文章,他对作者坚定的基督教信仰印象深刻,然后他就给布罗伊写了一封信。这个时期马里旦和贝圭正在合作编辑出版杂志。马里旦想出版布罗伊的著作《通过犹太人的拯救》(*Le salut par les Juifs*),并给他邮寄了25法郎。在

① [英]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布罗伊的影响下,1906年4月马里旦夫妇认真地思考了宗教价值,结果发现与哲学的世界相比,宗教的世界更能显示生命的终极意义,随后就做出了皈依天主教的决定。而这段时间蕾莎正身患重病,这可能也是马里旦夫妇皈依天主教的导因之一。



亨利·柏格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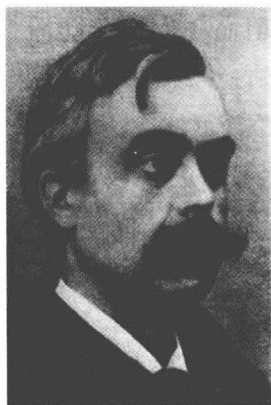
1906年6月11日,也就是马里旦结识布罗伊一年之后,马里旦夫妇在巴

黎蒙马特的圣·让福音教堂由埃贝·杜兰特(Abbé Durantel)神父主持进行了洗礼,布罗伊则是他们的教父。为了缓解可能带来的家庭压力,马里旦并未让其母亲知悉他皈依天主教这一事实。而蕾莎·马里旦的皈依则令其家人震惊,因为他们一直虔诚地践行着犹太教传统。马里旦的皈依使得他必须做出两方面的决定:其一,在天主教会和反教权的法兰西共和国之间进行选择;其二,在天主教正统观念和柏格森哲学之中做出决断。对于前者他最终放弃了在大学任教的机会,对于后者他放弃了世俗哲学。

1906年底,贝圭和马里旦之间的合作关系开始恶化。按照蕾莎的说法,这是由于马里旦与布罗伊之间联系的增多,使得贝圭颇感不悦,“贝圭与我之间令人不快的距离与日俱增:我们开始认识到他是那么容易地对人不公平(这对于他的性情是自然的事儿),而且他是那么的爱妒忌,总希望把朋友占为己有”^①。就是在这一

① Pierre L'Abbé: Jacques Maritain and Charles Péguy: A Reassessment, in John F. X. Knasas (eds.), *Jacques Maritain: The man and his Metaphysics*, American Maritain Association, 1988, p. 47.

年年底,马里旦前往海德堡,在汉斯·德里施(Hans Driesch)的指导下进行生物学研究。1907年3月,马里旦中途回到巴黎。在与贝圭共进午餐时得知其已经秘密皈依了天主教。这个消息只有包括马里旦夫妇在内的少数几个人知悉。在共同信仰之下,马里旦和贝圭之间的友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恢复。但贝圭在宗教信仰上的不坚定最终影响了二人之间的友谊。



莱昂·布罗伊

德国之行是马里旦从柏格森主义者转向托马斯主义者的重要时期。他的导师德里施把类似亚里士多德的生命圆满实现的概念引入到生物学之中,极大地冲击了当时的机械主义观念。而这时马里旦已经是一位坚定的天主教信徒,但尚未系统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的著作。正如他在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柏格森主义哲学》(*La philosophie bergsonienne*)第二版序言中写道:“正是在1908年,在海德堡周边的乡村,我一直在思考自己是否能够调和柏格森主义对显明教义的概念和规则的批判,宗教信仰的‘概念性’宣告与那种哲学原则之间的不可归约的冲突对我而言似乎是一种极其确定的事实之一,灵魂一旦开始承认这些事实就立刻认识到永难逃避。前者近期以来使我得以开拓视野,后者是我学生生涯期间热情思考的,也是使我得以摆脱物质主义所要感激的对象。”^①调和

① Jacques Maritain: *Bergsonian Philosophy and Thomism*, Trans. by Mabelle L. Andison in collaboration with J. Gordon Andison,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7, p. 16.